

方卫平
著

Fang Weiping
Ertong Wenxue
Lilun Wenji

方卫平
儿童文学
理论文集

卷一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批评史

明天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

思想的边界

文本与阐释

法国儿童文学导论

ISBN 7-5332-5020-6



9 787533 250201 >

定价：76.00 元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卷一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批评史

方卫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方卫平著.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6. 11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ISBN 7-5332-5020-6

I. 中... II. 方... III. 儿童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796 号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卷一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

方卫平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165×245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365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5020-6

I·1075 定价: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卷收入了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大量收集和深入研究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从自在走向自觉并不断推演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清晰、具体的历史描述和理论阐述,内容包括各个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理论思潮、学术特征、理论代表等等,并以历史和当代的双重理论眼光,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学科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本书史料翔实,阐述精当,见解独到,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极具理论深度。

本书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总策划
刘海栖

责任编辑
徐迪南

整体设计
牛钧



方卫平，祖籍湖南省湘潭县。1961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77年考入宁波师范学院读本科；1984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4年由讲师晋升为教授。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文化》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编委。曾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著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法国儿童文学导论》、《流浪与梦寻》、《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逃逸与守望》等，与人合作主编有《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儿童文学教程》等。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方卫平简介



1999年在宁波。（方卫民 摄）



小时候的一家人。



小学时代。



1978年秋，在甬江边。



1979年1月，上完一年大学了。

自序

一

我的学术梦想，最初是在宁波市郊三官堂那座即使在当时看起来也无比简陋、无比破败的校园里开始生长起来的。

我的少儿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从1967年上小学，到1977年高中毕业，中小学的十年光阴，几乎恰好与“文革”十年相伴随。在一个懵懂的年龄，我的记忆中收藏的是例如刘邓陶、彭罗陆杨的倒台、请红宝书，请主席宝像，“天天读”这样一些事件和场景。大约八岁的时候，我获得了平生第一份学习奖品——一本开本比我当时的手掌还要小的红宝书“老三篇”，扉页上写着“奖给近郊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

我所就读的双屿小学，归当时的温州市近郊区管辖。

这样的追溯也许过于遥远。但是回想起来，正是这样的事件和场景，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记忆，也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精神来源和背景。当然，更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关于那个时代虽然贫乏但却十分生动的文学阅读的记忆。我的书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闪闪的红星》、《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这本书是我初一第一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时的奖品）、《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等“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虹南作战史》，其他都是一些曾经让我和我的童年伙伴们，甚至长辈们读得如痴如醉的作品。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杨姓同学的父亲把《闪闪的红星》还给我时，满脸喜悦地告诉我说，这本书他读了两遍。“文革”时期出版的著名作品，我读过不少，特别是浩然先生的几乎所有作品，如《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欢乐的海》、《大肚子烟烟》（这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等，我都曾读过，而且现在想起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一本书我都读得十分痴迷。

连环画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读物之一。我和弟弟曾经拥有过大约三百余册“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出版物，其中包括《三条石》、《杨国福》、《二十响的驳壳枪》、《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在学校附近的乡村供销社的柜台外，瞪大眼睛发现一本本新到的连环画，成了我和弟弟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连环画的阅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上，的确曾经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

1977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心里盘算着如何打点行装，到哪个山村水乡

插队落户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在几乎毫无准备、毫无压力、毫无期待的情况下，我以我所就读中学的唯一被录取的文科考生身份，进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即后来的宁波师范学院，现已并入宁波大学）。

学校坐落在宁镇公路南侧、甬江之畔，那一带的地名叫三官塘。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报到那天走进校园，我还是感到十分意外。整个校园除了一座破旧的、空荡荡的礼堂之外，全是低矮简陋的平房，寝室、教室、办公室、阅览室等等，都散布于这些看起来已经很有年头的平房之中。就在这座校园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充满遐想的四年读书生活。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开始启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波一波不断推进的激情年代；也是一个文学思想不断革新，文学新作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的属于文学的时代。在度过了最初的漫无目标、疯狂阅读、视力急剧下降的学习生活后，我开始对阅读的现状感到不满，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学习方向和专业目标。这个时候，文艺学学科成了我的首选。大学一年级，徐季子先生、李燃青先生等主讲的文艺理论课，曾让我陶醉不已。徐先生授课思路开阔，大气磅礴，极富感染力；李先生授课学理严谨，思路绵密，引人入胜。这门课结束时，我以96分的考试成绩位列全班第一。

这个成绩使我在思考自己本科时代的学习方向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思考的某种潜质和才能。当然，我自己清楚的是，我对这门学科充满了兴趣和好感：一方面，它具有相当的思辨性、理论性，符合我喜爱理论思辨的性情；另一方面，它纵贯古今，辐射中外，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等等，都在它的论述和统摄之中，这符合我偏爱艺文、寻求美感的人生趣味。于是，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把文艺学确定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方向。

就这样，我把自己整天泡在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到莱辛、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卢卡契，从陆机、刘勰、袁枚、王国维到朱光潜、李泽厚、钱锺书、王朝闻等的著作和文章之中，泡在了各种学术性期刊和报纸的阅读之中，并在这种阅读当中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理论趣味。例如，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是我了解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入门读物。我很喜欢朱先生深入浅出、质朴清激的理论文风，也很喜欢读他那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美学译著，如《柏拉图文艺论集》、维科的《新科学》、黑格尔的四卷本《美学》等等。我也特别喜欢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和著作。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美学论集》等著作都是我爱不释手、品读再三的美学著作。李先生著作独特的思辨色彩、充满激情和华美感的理论文体，使他和朱先生一起，成为我大学时代心目中的学术偶像。

就在高密度、大容量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文艺学与美学有着天然的联

系和诸多学科内容上的交叉之处，而美学又与哲学有着学科上的从属关系，它们又都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文艺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构成了我大学时代学术阅读的主要方向，并构成了我当时知识结构中的主要学科板块。

在阅读中我也发现，有的美学家的理论著作和思考脱离了对艺术与美的真切体悟和欣赏，而往往只是从概念和教条出发，于是观点机械僵硬，文风涩滞乏味。为了避免成为这样的研究者，整个大学时代，我在力图博览中外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广涉音乐、美术、书法、建筑、影视、戏曲等艺术领域的各种知识，注重艺术欣赏和体验的积累。许多年来，我之所以对大学时代的生活充满了怀念和感激，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感到，知识的汲取、视野的拓展、情操的陶冶、人性的美化获得了一种完美的融合。

一进入大学三年级，我的幼稚而又坚韧的学术研究欲望便被撩拨起来，不可扼制。从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我一边思考，一边摸索，一边尝试性地开始了学术性文字的练习和写作。记得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创作方法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取消》。一万余字的稿子写完后，落在了课桌上，被班里一位同学发现，他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惊呼：“方卫平在写论文！”我羞得无地自容，心想真是太丢人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却迷恋上了这样的与文字的亲近和搏斗，又陆续写下了《柏拉图文艺观点刍议》、《自然的人化与自然的客观性》、《浅谈艺术个性》、《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吗》、《意识流手法与现实主义文学》等约二十篇学术性练习文字。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我还写过一篇《试论美的本质》，试图一举解决数千年来中外哲人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美学思想难题，真所谓“无知者无畏”。后来，一位友人知道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想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的一位知名美学家看看，我硬是惊恐得不敢拿出来示人。也许，有时候“无知者”还是“有畏”的。

大学四年级时，我的六千余字的习作《浅谈艺术个性》经考师推荐，发表在了学校的学报上。由于自觉文章浅陋，这篇处女作的发表并未给我带来多大的喜悦。但是，我的学术理想却从此被点燃了。

甬江之畔的那座简陋、破败的校园里，在我毕业的时候，已经矗立起了新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感恩之情——对我的大学校园，对我的青春岁月。

二

1982年初，我被分配到了浙东一所小镇中学任教。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读书时代的学术理想之间，不免有了一点小小的抵牾。我一边尽职地工作，

一边自学英语，一边继续着学术性的写作练习。这年春天，大学同班的周耀明同学来到我工作的中学。我们促膝长谈，直到天明。耀明在大学时代把研究兴趣和学术方向设定在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两个学科。毕业前，他带着六万字的富于创见和学科建构力的《试论风俗》一文，参加“新时期浙江省首届民俗学研讨会”，引起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的关注。从此，他把自己的学术方向集中到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那个晚上，我在与耀明讨论报考研究生的学科选择时，他问我对儿童文学研究有无兴趣。我说好啊，可以试试。

就是那个春天的一夜长谈，确定了我此生的学术归宿。

2005年8月19日，怀抱着无限的学术才情和理想的耀民同学因患癌症在南宁病逝。此刻，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富有才情、勤奋刻苦、率真耿介的亡友的怀念之情。

1984年，我报考了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2月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蒋风先生的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在62名考生的激烈竞争中，我最终成为两名被录取者之一。在此之前，我已经发表了《教师笔下的少年形象》等几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而进入浙江师范大学学习，我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之梦，终于在这所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在中间的大学里获得了一片最为理想的校园文化沃土。那两个村子，南边的那个叫骆家塘，北边的那个叫做高村。

重新回到大学校园，重新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接触到了许多新的学说和创立这些学说的人们的名字。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理论、接受美学等等20世纪的西方学术文化学说正在被广泛地介绍和传播：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也在被人们尝试着用来解决文艺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问题；熵、高情感、测不准原理等概念和原理频频出现于人们的学术思考和话语表述之中。我在自己的第二本论文集《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的“后记”中曾经谈到，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尽快地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我首先选择了那个刚刚去世几年的瑞士老头儿让·皮亚杰。啃皮亚杰，借发生认识论学说来尝试思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问题，成了我返回大学校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到20天，我磕磕绊绊地写出了这第一篇文字”。这就是《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一文。

这似乎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界第一篇运用皮亚杰学说来讨论儿童文学学术问题的论文，也是儿童文学界较早引入当代西方学术话语资源进行本土性理论思考的一次尝试，幼稚是难以避免的。不过，这篇论文在次年发表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甚至是文艺理论界的注意，而我自己也从这样的尝试中，感受到了借助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思考儿童文学理论话题的某种可行性和有效性。

大学时代强烈的理论爱好，在这个时候有了合理的延伸，这就是我对儿

童文学基本理论进行思考和探究的浓厚兴趣。大体上可以说,关于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思考,构成了我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个重心或板块。

继《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一文之后,我还陆续写作并发表过《儿童文学本体现的倾斜及其重建》、《儿童文学文本结构分析》、《论儿童审美心理建构对儿童文学文本构成形态的影响》、《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论文,后来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一书。

从事基本理论的探究,除了我本人的理论爱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感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基本学术资源上的匮乏和学术空间上的狭窄。当然,我也意识到,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既需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更要有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可能逐渐现出成效。

毋庸讳言,我与我的学术同侪们是在一个除旧布新的学术年代里闯入儿童文学思想领地的。这使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思考者拥有了一些共同的学术心性和文化心理。例如,我们对儿童文学已有的历史深怀热爱之情,但同时又对传统守旧的创作规则、美学观念和僵化庸俗的学术意识形态深感不满:我们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起点必须借助于传统与现实的供给,但我们对其又普遍而经常地抱着游离、叛逆和质询的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复合性的学术性格,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未来都怀有某种纷乱而又不安的情感。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就是对现实的批评,对未来的憧憬,都应该以对历史的了解和尊重为基础。因此,对儿童文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就成了我从事儿童文学理论活动的第二个重心。

1985年7月,我参加了由文化部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会议的话题和发言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许多撞击和思索。我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的“后记”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我觉得,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展望和规划,应该以对历史和现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位置 and 理论起点、儿童文学理论的未来建设才可能成为一种清醒的、自觉的理论活动——而会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讨似乎不很充分。带着这样的思索,我于这年9月初返校之后,结合自己平时的学习积累和心得,花一个多星期写下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1986年第6期《文艺评论》上的《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在表达对当时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和忧虑的同时也认为:“对历史的透视将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提供某种可能性……至少在主观上,我们对现实的考察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于是,我把自己很大的一部分热情投入到了中外儿童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之中。在陆续发表了《理论的迷误与理论

的建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等文章，并参与《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等的选编、撰写工作之后，我于1992年7月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的写作。该书1993年8月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当时出版的另一些儿童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童话史》、《外国童话史》等一起，显示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史研究逐渐细分化，儿童文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厚实的发展趋向。

后来，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我又完成了《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一书。我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但我又深知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推出一套《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写作的前期准备上，我丝毫不敢马虎。这本书是在历时整整6年的资料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书名虽然是《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但其内容和结构，其实就是一部法国儿童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我知道从外国文学研究专业的角度，我的研究能力和准备都是很不够的，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当中，我力求把自己并不充分的能力加以最大化的写作转化和实现。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界，与我们这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时代相伴随，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潮和创作面貌也发生着不断的变迁与更新。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从业者，我自然一直对这样的变迁与更新满怀好奇、追踪与言说的冲动。所以，对当前儿童文学思潮和现象的跟踪与评论，构成了我从事儿童文学思考的第三个主要板块。

还在读研究生时，我就尝试写作了《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童话的立体结构与创新》等一些关注、跟踪儿童文学创作思潮和发展现实的理论文章。后来，又陆续发表过《少年小说：对新的艺术可能的探寻》、《少年文学的自觉与困惑》、《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儿童文学本体建构与九十年代创作走势》等视野较为宏观的评论文章。应《儿童文学选刊》主编周晓先生之约，我还为该刊写过《走向新的艺术常态》、《1990：少年小说的艺术风度》、《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寻求新的艺术话语》等评论文章。对我个人而言，这样的关注、跟踪和评论写作，不仅让我能够不断地感受着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脉动，而且也使我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和思想进程中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工作，使我的整个思考和研究活动，与我们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并且让我自身在整个学术思考活动过程中，也体验到了更为鲜活的学术生命感。

我的上述理论和评论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了我的三本评论集：1994年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流浪与梦寻——方卫平儿童文学文论》、1995

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逃逸与守望——论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及其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及其生存环境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状况，童年生活和童年品质的变化，读图时代、网络时代的降临，流行文化、商业文化的强势侵入，都使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件事情对我个人近年来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件事情是，2000年11月，应新蕾出版社之邀，我与四位友人一起在天津远洋宾馆的一间客房里，面对着两台录音机，围绕着12个有关儿童文学的话题，进行了持续六天五夜的碰撞、交锋和对话。几位作家、学者朋友各具特性的学养、视野或者局限，在那样一次极富机锋与深度的交流和对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给了我许多生动而切实的启示。另外一件事情是，2000年12月，应王尚文教授之邀，我参与了《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主编工作。在长达整整一年的编选及配合王先生统稿的过程中，在地毯式地收集、阅读中外文学精品，包括儿童文学精品的过程中，我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开始与当代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少年儿童的 actual 阅读生活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我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阅读趣味和评判尺度也经受了一次革命性的打击和洗礼。这两件几乎是连续发生的事情，使我个人面对儿童文学时的思考眼光、判断标准等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相信，这些变化在我今后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活动过程中，还会逐渐地显现出来。

永远不会变化的，则应该是我对单纯而又富饶的儿童文学、对独立而又纯粹的学术思考的迷恋和热爱。

三

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写作已经有25个年头了。儿童文学研究这个职业，给了我的人生和整个生活太多的馈赠和赐予，而我也在这条路上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如果说中年有一个人生驿站的话，那么我希望这个驿站只是又一次出发前的一个小小的歇息场所。对于儿童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我的学术之梦还没有止息。

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

1990年5月，我在昆明的“90年代儿童文学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曾经认为，儿童文学理论除了服务于实践的应用价值外，还应该有一种理论自身的本体意义上的价值，它显示了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智力水平和思维的全部创造力，展示了理论自身的深邃、超拔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历代

哲人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会具有那么吸引人的、令人深思、令人感动的力量的原因。我还认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应追求一种超越以往儿童文学研究水准的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更宏阔的理论境界。事实上，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可以为整个文艺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学科提供思维成果和理论材料。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具有这样的学术胸怀和抱负。1990年11月，在为《流浪与梦寻》一书所写的“跋”中，我也曾谈到：“我有一个梦想：通过儿童文学的理论探寻，从一个方面承担起这一代人最终的文化使命。我相信，儿童文学研究就其内在的文化生命意蕴而言，是指向人类精神的深处的——那里是我们精神的起点和归宿。”

今天，我仍然怀有这样的梦想。

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批评是坦诚的、智慧的、是富有勇气和道义感的。

儿童文学批评的失语状态是我许多年来一直深感不安和焦虑的。这种失语状态并不是说当今的儿童文学批评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说，真正富有批评锋芒和批评勇气的声音实在是太稀缺、太微弱了。在《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我曾经指出，今天的批评已经恶俗化、庸俗化了，已经被一种非批评的意志异化了。批评的第一个特征应该是它的独立性，而在这个时代，强调它的独立性是更重要的。所谓批评缺乏独立性，就是指它已经被世俗的、非学术的、非自由的一种意志所收买了，这是批评的悲哀，也是整个儿童文学界的不幸。

健康的儿童文学批评应该是对儿童文学负责任的、坦诚的批评。批评者面对的是文学，怀有的是艺术的操守，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因为艺术上的平等和差异而被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首先应该珍爱和疼惜的是关于文学和美学的真理与良知。而当批评被太多的义气和世俗价值观念所主宰的时候，批评的堕落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健康的儿童文学批评也应该是富有智慧和眼光的。批评者的文学素养，包括知识的累积和鉴赏眼光的培养，都应该是专业的，值得信赖的。而通向这一境界的途径，是批评者在批评职业中保持一种永久的恭敬和敬畏之心、一种永久的吸收和学习心态。反过来，那种在自我迷醉中形成的守成和封闭心理，只会导致批评行为的破绽百出、贻笑大方。

我还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是开放的、充满现场感和当代意识的。

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一方面期待着新的理论充实与学科提升，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学生活又不断地向儿童文学学术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现实疑惑和研究课题。在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视野与论域拓展、方法与话语更新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

因此，儿童文学研究正期待着几代学人的携手和努力，以创造一个能够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学术和理论时代。

最后，我也希望，我仍然会是这样一个前行中的理论时代的携手者和相伴者。

这部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收入了二十多年来我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发表的一些主要文字。其中第一卷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卷收入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一些论文以及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第三卷为儿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方面的研究和评论文章，第四卷为《法国儿童文学导论》。

我相信，这套文集的出版，对于我个人而言，既是往昔学术生命的一个总结，也是以往研究历程的一次清算，或许，还应该是继续前行的一个台阶。

2006年6月22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